

家庭语言政策之情感定位与社会投资研究

——以五组欧洲汉语继承语学习者家庭为例

高晓芬

摘要

汉语继承语的学习在海外中国移民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Spolsky 在他的语言政策理论中提出家庭是语言管理的关键领域之一，也是儿童语言习得的重要场所。因此，家庭对于继承语的维护至关重要，对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和教育意义。

本人通过质性研究的深度访谈法，探索了欧洲三国（荷兰、德国、比利时）浙籍五组华侨华人的家庭语言政策。本研究采用了 Spolsky (2004) 的家庭语言政策理论，辅助以 Coleman (1988) 的社会资本理论对采集的数据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分析，并从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三个角度审视了这些家庭语言政策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语言政策在继承语学习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因为家庭语言政策的不同而导致最后的学习效果不同。同时家庭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同样影响着这些人的汉语继承语的学习。当前研究的结果有助于加深对海外华人不同代际之间的继承语实践及其家庭语言政策的理解和探讨。此外，笔者还注意到欧亚合作新形势下，家庭语言政策的理论创新研究和应用实践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并提出通过有效继承和文化学习解决身份认同的缺失和社会投资的实现。

关键词：家庭语言政策 汉语继承语 社会投资

一、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以质性研究的方法，对五组欧洲汉语继承语学习者家庭进行深度访谈，对数据整理分析并讨论汉语继承语学习者家庭语言政策中情感定位和社会投资的交互影响，并为欧亚合作新形势下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提供启示。

二、现状

（一）欧洲的华侨华人汉语继承语学习的情况

对于欧洲华侨华人的研究，国内开展的较早。上世纪初就有学者专门开展了研究探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华侨华人发展史的领域，如李明欢的《欧洲华侨华人史》，章志诚的《战后欧洲华侨华人经济初探》，徐斌的《欧洲华侨经济》，俞齐的《欧洲华人的昨日和今天》等，《浙江省华侨志》是浙江省首部华侨志书，主要讲述了浙江省华侨的历史与现状。

近代浙江华侨分布的特点是：走出亚洲，远涉欧美。从古代旅居东北亚、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扩大到近代 40 多个国家。近代浙籍华侨的职业相对于他们古代先辈，趋向多样化。在普通侨民中，除少数人从事进出口贸易外，大多数人从事零售业、泥木、缝纫等手工业，到这个时期的后期有餐饮业、皮革业，但数量有限。现当代海外浙江人的职业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实力已有重大变化和发展。2010 统计数据显示浙江华侨华人分布的重点地区在欧洲，有 63.6 万人，占该洲华侨华人总人数的 29.30%。这期间，浙江旅居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和地区的侨胞纷纷创办中文学校（班），迎来浙江海外汉语继承语教育由普及到快速发展的阶段。浙江侨胞既有对后代加强汉语继承语学习的热切需求，也有一种紧迫感。华裔从小接受住在国教育，生活成长于当地国，决定了他们与父辈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他们住在中国文化的家里，又出入于西方社会。这种东西方文化差异常常给他们带来困惑，致使他们在家里与父母之间有文

化和代际的隔膜。到了外面，又与当地社会有文化和种族的隔膜。因此汉语继承语的学习，也是为了让他们走近祖（籍）国，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和风土人情，使他们更容易取得身份认同（《浙江省华侨志》，2010）。

同时，浙籍侨胞还普遍结社建团，以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浙籍侨胞活跃于住在国社会，在侨团侨社中有较强的号召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他们既为自己事业发展，也为推动居住国与浙江省在经济、科技、商贸和文化等各种合作交流，热心组建侨团、商会、专业协会。据不完全统计，至2010年，在欧洲以新侨民为主流的浙江籍侨（社）团、各种同乡会组织、或以浙籍侨胞为主要成员的侨团有485个。

欧洲地区的汉语继承语教育发端很早，其特点是主要在华人社区开展，学生少，教师少。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大批大陆和台湾、香港等移民欧洲，欧洲学校开设汉语课程，汉语继承语教育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复苏时期和大发展时期。

欧洲有着悠久的汉语教学历史，从元朝开始，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升温，汉语成了欧洲人视野中的一道独特的语言风景，汉语的传播也涌起了前所未有的巨浪，欧洲的传教士是近代汉语传播的开路先锋和头号功臣。欧洲四十多个国家汉语教育的发展参差不齐，各国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着汉语教育的发展和持久性。但它们都是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国别汉语教学历史研究是欧洲汉语二语教学的学科理论研究所不能回避的领域。目前，欧洲汉语教学协会正在制定的《欧洲汉语教学白皮书》，恰恰是要在学科建设的框架内努力弥补汉语教学史理论上的不足。欧洲汉语教学发展比较成规模的几个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以及这些国家的部分大学与欧洲汉语教学协会等单位 and 机构，都义不容辞地在积极推动汉语教学学科发展与建设所需要构筑的两大理论体系（周敏康，2020）。

(二) 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方法和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对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方法有量化方法、质化方法，也有混合法。其中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法、民族志法、观察法是目前广泛采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家庭语言政策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对语言学，对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也有很多新的发现。家庭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不仅对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更具有解决问题的现实意义（李英姿，2018）。

目前国内虽然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但是还没有更多有高度的实证性研究成果问世。李宇明（2015）强调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也应考虑家庭、个人、社区领域的语言问题，研究路线也更应从自下而上考虑。家庭构成了一个最小的场域，家庭是语言政策研究的起点，也是语言政策实施最有效的场所（李英姿，2015）。伴随着英语世界范围的传播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语言生活现状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有大量中国家庭因商务、留学、移民等原因旅居海外，如何在外语环境下保持汉语，如何同时获得双语能力等；这些家庭在子女语言教育方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都应该是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目前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依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话语、英语体系倾向。

参照前人的研究，本研究主要采用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中两大主流理论：Spolsky(2004)的家庭语言政策理论，辅助以Coleman(1988)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Spolsky(2004)所提出的家庭语言政策的三维框架，该模型由三个互相关联的部分组成，包括语言信念、语言管理与语言实践；Coleman(1988)所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认为资本主要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种形式，社会资本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社会组织中，他将社会资源定义为家庭中的一种资源，家庭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

1. Spolsky 的家庭语言政策理论

Spolsky(2004)在《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一书中提出了语言政策的三个部分，它们各不相同，又相互联系，即语言意识形态，

语言实践、语言规划或管理。

语言意识形态是“语言及语言使用的信仰”(Spolsky, 2012), 语言管理指“某人或者某组织具有或者声称的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语言实践或者语言信仰而做的明确的和可观察到的努力”。语言管理可以改变语言意识, 语言意识由语言实践得出, 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实践, 语言实践提供语言环境和语言管理的工具, 同时也是语言管理的目标。影响语言意识形态的来源有四种主要的语言和非语言环境或条件: 社会语言学背景、社会文化背景、社会经济背景、社会政治背景 (Spolsky, 2004)。

Spolsky 创建的三重理论框架拓展了人们对家庭语言政策的理解, 对家庭领域的语言政策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King, 2008), 同时也促进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

当前许多研究都以 Spolsky 的框架为基础, 经常探讨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政策、语言管理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 一些学者通过揭示父母信念如何影响语言实践, 有时甚至会导致某些管理努力, 来说明这些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又或者, 当移民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学习住在国语言会受到继承语语言的影响时, 他们可能会调整他们的做法, 避免使用他们认为是阻碍的语言。反之, 对其继承语语言持积极态度的父母会用该语言与子女交谈。Hollebeke (2022) 通过调查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776 个多语言家庭的语言政策, 将 Spolsky 语言政策三角框架 (包括意识形态、实践和管理) 定量应用于家庭领域。分析结果证实, 家庭领域的语言政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构, 尽管三个组成部分相互关联, 但仍然可以相互独立地进行描述。此外, 家庭语言政策对儿童和整个家庭的潜在短期和长期影响 (Hollebeke, 2020), 强调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价值和相关性。研究考虑了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的外部力量, 发现个人和家庭拥有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当研究语言政策时, 无论是在家庭领域还是在机构背景 (例如国家、学校) 中, Spolsky 的框架较为成熟并且经常使用。

2.Coleman 的社会资本理论

Coleman 认为资本分为很多种类型，每个自然人一出生就拥有以下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物质性条件，如土地、货币等物质资本；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具有其本身的特征。

社会资本是指行为者之间不太有形但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关系，“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组织中，并且对儿童或年轻人的认知或社会发展有用”。其关键在于，社会群体（例如家庭、学校和社区）中的个人（例如父母、老师、邻居和孩子）之间的社会结构关系是提高儿童能力的社会资本的来源。在 Coleman 的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五个维度 (Bassani, 2007)，包括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社会规范、权威关系和社会组织，这些形式都直接来源于他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概念体系，与行动系统的基本元素直接相关。社会资本是一种个人通过自己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而获得的资源，在结构中对网络关系的投资可以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收益。社会资本源自人们的社会关系，它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

社会资本被视为成人和儿童家庭关系中的一种资源，它使青少年能够获得人力资本，没有社会资本，父母就无法将其他形式的资本转移给他们的孩子（例如，人力、金融、文化、语言、抱负）。Coleman 提出了形成家庭社会资本的六个指标：(1) 父母双方在家庭中的存在，(2) 兄弟姐妹的数量，(3) 与孩子谈论个人事务，(4) 孩子上学前母亲外出工作，(5) 父母对孩子上大学的兴趣，(6) 孩子因为家庭搬家而转学的次数。

三、研究方法

(一) 质性研究方法设计；

本研究的研究设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具体包括研究设计、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这三个部分相互关联，具有逻辑性，以及对质性研

究的质量评估也是质性研究的一部分。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是：(1) 五组三代浙籍华侨华人家庭采用哪些家庭语言政策？他们的家庭语言政策是如何体现社会资本投资和情感传递的？(2) 祖父母、父母、子女三代之间家庭语言政策的交互影响是什么？子代如何看待他们父母或祖父母的家庭语言政策及其执行策略？接下来将介绍本研究所采用的访谈方法。

(二) 五组家庭深度访谈法设计：

本研究对这五个家庭的父亲、母亲、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孩子们分别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每位访谈持续时间为一小时左右，了解家庭对语言学习的影响、移民动机、受教育水平、从事的行业、继承语的学习等方面的经验。本研究的访谈是灵活机动的，无一定的规定，但是事先也选取了问题的某些方面作为访谈的重点，访谈的问题主要是围绕五组华侨华人的家庭语言政策展开，如父母对孩子语言学习的态度，祖父母对孩子语言学习的态度等。访谈过程中就会引出其他必要的信息和事先预设之外的信息，而意外的信息往往会带来研究问题的突破。

1. 问题设计

深度访谈的问题是开放式的，没有固定的答案以及选项，问题简单，一次只问一个问题。比如：你的个人经历对你的语言态度有影响吗？你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期望等问题。

笔者希望得到的并非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因此要注意开放式问题的遣词，让受访者从自身的立场来描述问题的感受。开放式问题使得受访者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而问题之后的主动试探则提醒采访者询问特定的话题，以确保与研究内容有关的详细信息均被采集。

2. 数据采集准备

深度访谈前的准备工作包括要获得研究许可，着手建立与研究对象的融洽关系，与受访者预约访谈。最初，笔者通过微信和第一位受

访者 A 家庭祖父母辈的陈女士取得了联系，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得到了对方的肯定，并在陈女士的牵线搭桥下，建立了受访者的聊天群，并且进一步约定访谈时间，同时请她介绍后面的受访者。

3. 访谈过程

首先发展融洽关系：研究者向受访者表达善意，建立融洽关系。深度访谈和一般访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信任关系的建立 (Hennick et al., 2020)。研究者与受访者首次见面，适当寒暄，如闲聊，谈论天气、喝咖啡或者茶等日常活动，建立熟悉的、信赖的关系，并注意眼神交流，鼓励受访者畅所欲言，鼓励受访者分享内心的想法和感受，收集到的资料就不会过于表浅。

其次发问和激励性试探：深度访谈是访谈，不是对话，对话的重点是双向的信息交流，而访谈的重点是引出受访者的故事。即使受访者的观点有误或者与采访者的观点不同，也要尊重受访者的观点和故事。我们在深入访谈中，没有对与错的回应。笔者在设计访谈提纲的问题时，应该采用无偏向的发问方式，避免引导受访者。采访者要耐心倾听，聆听受访者的讲述，让他们讲的更多。同时，要尊重访谈者适当的沉默和停顿给受访者空间，让受访者回顾、反思和考虑要讨论的细节。

最后结束访谈：深度访谈一般不超过 90 分钟。但是在笔者的访谈中，有些受访者比较热情也愿意多谈一点，笔者也耐心地听完了他们的分享。

4. 记录和转录

如何将面对面的访谈记录下来，不管是手写、录音、录像的方法，都和笔者的需要和受访者的要求有关。访谈结束，笔者通过科大讯飞软件先对音频做一个初步的转录，然后再细化整理。同时，结合深度访谈时候的备注，完善每一个受访者的访谈内容的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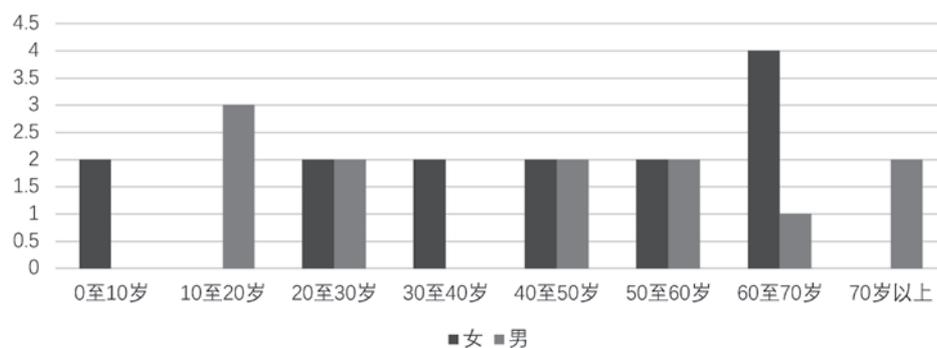
四、访谈整理分析

以下数据源自五组家庭，访谈语言以普通话为主，适时辅助以英语或者在家人的普通话翻译的帮助下进行，年龄在 10 到 74 岁之间，具体参与访谈的人数（表 4.1）、年龄段分布（图 4.1）。

表 4.1：A-E 家庭访谈人数统计

分类	祖父母辈		父母辈		子女辈		总计（人）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A 家庭	1 (68)	1 (74)	1 (41)	1 (42)	1 (10)	1 (12)	6
B 家庭	1 (69)		1 (52)	1 (55)	1 (25)		4
C 家庭	1 (62)		1 (43)	1 (45)		1 (15)	4
D 家庭		1 (71)	1 (52)	1 (50)		2 (23, 19)	5
E 家庭	1 (62)	1 (65)	3 (37, 34, 27)	1 (29)	1 (10)		7
总计（人）	4	3	7	5	3	4	26

图 4.1：A-E 家庭受访者性别、年龄段分布图



在家庭语言政策和家庭投资框架的理论视角下，笔者通过对五组家庭的深度访谈，发现三代海外华人家庭语言政策在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中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发现家

养双语或者多语能力。他们将英语视为“国际语言”，因此它不仅比汉语更有声望，也更有经济价值。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也正是这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也导致这些家庭的语言意识形态是动态变化的。这些家庭认为他们学中文也不外乎是以下几个理由（表 4.2）：

表 4.2：五组家庭三代人认为学中文的原因汇总

	主观	客观
为什么学中文	身份的象征	中资企业增多
	中国人的责任	中欧关系
	家庭的沟通	孩子自身的发展
	内在的血脉联系	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化
	兴趣	中国语言越来越厉害
	方便旅游	

子女辈的语言管理主要是当地语言的学习，他们都熟练掌握了当地语言，在汉语学习方面他们的管理手段也比较多样化，子女辈人的年龄跨度有点大，从小学到研究生，他们不同于自己的父母，他们都有机会或者有条件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孩子自己本身的兴趣也会影响孩子汉语的学习。他们中有几个中文比较好的，是受家庭环境影响比较多的，或者有从事和中文相关工作的，再者就是在中国有留学经历的。他们的汉语继承语学习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表 4.3）：

表 4.3：五组家庭子女辈人最主要的学习中文的方式

子女辈	家庭中文沟通	主要学习渠道	是否请家教	去中国留学	工作和中国有关
A 家庭	是	妈妈自己教	否	否	不确定
B 家庭	是	中文学校	否	否	是
C 家庭	是	中文学校	否	否	不确定
D 家庭	是	中文学校	是	是	不确定
E 家庭	是	中文学校	否	否	否

Coleman (1988) 社会资本存在于家庭内部，也存在于家庭之外，Coleman 指出“人的行为受到社会环境的塑造、约束；规范、人际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不仅在社会运作中很重要，而且在经济运作中也很重要”。研究表明，经济资本可以用来获得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能分开，因为有财富的人有更大的能力建立社会关系，这对促进汉语继承语言学习至关重要。

作为移民的家长，必须同时考虑语言的工具价值和文化价值及后代华人身份的建构。除这五组家庭中，经济资本在创造社会资本中发挥着作用。例如，B 家庭和 D 家庭，父母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继承语学习的机会，如去留学，去实习，回中国，请家教等，这些都是需要经济资本的支持。A 家庭的母亲，致力于自己教孩子中文。E 家庭的母亲非常上进，在一定程度上向孩子传递了她的规范和价值观的社会资本的能力。

社会资本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就是除了语言政策的影响，社会资本的影响不可或缺。虽然语言能力在许多国家被视为移民儿童融入社会的工具和归属感的必要组成部分，语言只是他们面临的众多问题中最明显的一个，包括结交新朋友、适应新学校和新文化、应对失落和孤独、应对种族主义或反移民情绪等。移民父母的工作和社交生活可能部分地局限在他们自己社区网络的种族和语言边界内，而他们的孩子的教育和社会化需要他们接触和参与东道国社会、文化和制度。就这些欧洲的浙籍华侨华人而言，一方面，许多父母可能会引导年轻人上学。然而，家长缺乏某些资源，例如语言知识以及学校系统如何影响学校表现的知识。例如，移民身份会影响学校的种类和青年融入的同伴网络的类型。

为了取得成功，年轻人利用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来应对新环境中的困难，以缓解焦虑和孤立。社交网络可以作为流动青年的适应性策略，帮助他们结交朋友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当流动青年通过学校和社区的社交网络积累社会资本时，东道国的社会融合就更有可能发生 (Hébert, 2006)。孩子们通常比他们的移民父母更快地适应新文化 (Portes, 2001)。这可能对家庭动态产生重要影响。D 家庭的例子

也表明了社会资本在孩子语言学习方面的作用。因此社会资本也从一定程度影响他们的家庭语言政策。

五、研究启示

(一) 家庭语言政策源自自上而下的情感定位

祖父母辈人和父母辈人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第二类是幼年时期去的欧洲，第三类是成年后通过工作或者婚姻去的欧洲。虽然类别不同，但是这一代人的汉语普遍还是比较好的。笔者访谈的这五组家庭，因为艰苦的移民背景，还有为着生计所迫地劳碌，这两代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较低。他们对中国都比较有感情，中文都还不错。他们从事的职业也差不多。谈及中国，他们还是非常熟悉的，言语间对中国也是有着特别的情感。这两代人都曾经试图在家里说更多的普通话，以提高下一代的语言技能。同时，这两代人对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前景的渴望，无外乎两点，一是关注汉语继承语的工具价值，其次是其文化价值。

祖父母辈人和子女辈人，这两代人相差比较远，最直接的共同性就是他们都有着同样的中国人的血脉，有着实际的情感传递的需求。子女辈人为了能和祖父母辈人顺畅沟通，会尽可能使用中文，祖父母辈人为了能听懂子女辈人，他们也不排除对新的语言的学习和接受。实际上思想相差甚远，这两代人的差异非常明显，虽然都有着他们口中所说的中国的血脉，但是思想已经千差万别了。祖父母辈人普遍非常传统，而子女辈人的思想就非常多元。祖父母辈会的语言也少，几乎就是中文为主，但是子女辈至少都会两种以上的语言。他们在情感的沟通上不像传统家庭的祖辈孙辈，一是因为思想，二是因为语言沟通，相互之间不能太深入地交流。祖父母辈和子女辈之间看似距离远，但是在父母辈作为桥梁的过程中，祖父母辈往往因为不会当地语言，迫使父母辈，特别是子女辈学习汉语以便完成家庭的日常沟通。很多华侨华人家庭还是非常传统的，祖父母辈肩负着帮助父母辈照看孩子的任务，这为子女辈提供了密集和日常的汉语继承语输入。所以

对子女辈语言启蒙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比如，在E家庭中，父母辈中文很一般，子女辈的中文启蒙都是祖父母辈负责。C家庭的子女辈虽然不喜欢中文，中文学校也只是上了两年，但是小时候因为祖父母辈带，在排斥中文的情况下还是对他们的中文水平有正向影响。大多数祖父母辈还在家里观看中国电视节目，主要是中国新闻等，这增加了子女辈的汉语继承语语言输入，有着潜移默化地影响。

再次，祖父母辈也会经常从情感上去影响孩子。因为祖父母辈人对中国还是有深深的感情的，他们对中国也非常了解。他们会给孩子们做中餐，告诉孩子们关于中国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孩子们对中国的情感。

同时，子女辈对祖父母辈也有着影响，因为要相互沟通，无形中祖父母辈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由传统向更具包容性转变，也会接纳子女辈的语言选择。日常中，他们还需要子女辈帮助沟通当地语言。研究表明，子女辈不仅仅是父母文化的接受者，而且还可以是家庭资本积累过程的关键贡献者（Devine, 2009），孩子们常常成为长辈们解释所在社会的文化或语言中间人。

（二）家庭语言政策源自自上而下的社会投资

这里的投资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父母对孩子的社会投资，根据Coleman的社会资本理论，父母通过家庭资本来实现其他物质资本的转换。纵观上述，笔者发现社会资本在汉语继承语的学习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社会资本的缺乏会影响家庭语言政策实施之后的效果。但是只关注社会资本，家庭语言政策跟不上也很难学好语言。因此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汉语继承语的学习。

第二个投资意为在欧洲的背景下，汉语继承语被视为一种资产、一种投资、一种优势。大多数父母都提到了精通汉语的好处，他们试图理清汉语继承语与当地语言之间的关系，认为学会汉语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在未来的工作中有更强的竞争力。研究结果还表明，家长对多种外语学习作为获取文化资本的一种手段的看法，而文化资本对于孩子未来的成功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家长对孩子多元能力

作为文化资本的价值的评价为出发点来理解他们制定和实施的家庭语言政策。因为父母的出发点不同，他们的家庭语言政策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根据他们的行为和情感投资的数量或质量来进行比较。

其三，投资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本研究的这些发现为家庭中一些家庭内部因素（Schwartz, 2008）对汉语继承语保存和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家庭语言政策的优势提供了证据。对五个家庭的语言意识形态和实践的结果表明，他们成长的社会经济环境可以很好地预测他们倾向于使用什么语言。再者是教育体系，如果在他们的基础教育当中，没有中文课程的设置，会影响他们对汉语继承语的学习。同时，英语是很多学校授课的官方语言，因此他们的孩子掌握英语非常重要。只有部分人，例如B家庭的子女辈在学校的时候自己学习了中文。此外，就是社区和亲属，A家庭父母辈住的地方没有什么中国人，因此他们很少和中国人沟通。再次，我们看到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兴起对语言的学习有一定帮助。

（三）汉语继承语学习者家庭在欧亚合作新形势下的机遇与担忧

对于语言的学习者来说，浮于表面的语言学习效果往往是不能持久的。这些汉语继承语学习者，语言学习最初的时候通常是长辈的引导，但是随着成长，需要自我的内驱力才能将语言学得好。语言的学习是一种表现，更深层次的是对这种文化的认可和喜爱。同理，学习汉语继承语，只有对语言背后的文化感兴趣，对历史了解才能让学习者可以更深入地去学习这门语言。很多子女辈在原本已经放弃中文的情况下，因为长大后对中文重拾兴起，会积极主动地去学汉语继承语，这比在父母的要求下学更加有效果和持久。

在与五个家庭的访谈过程中，笔者深感不同家庭语言政策下家庭发展的巨大差别，也深感作为语言教育工作者的责任重大。五组家庭的家庭语言政策及发展呈现为三类表现：第一类是随着代际的不断融入当地，家庭语言政策缺少必要的引导，子女辈人逐步产生抵触中文学习的情绪，祖辈的社会资本投资也随着代际传递失去具体目标；第二类是家庭语言政策具有明确的投资目标，比如希望通过适当的学

习与引导，使家庭的子女辈成为医生等当地收入较高更受人尊重的职业；第三类是祖父母辈与父母辈人均有明确的“身份认同”的观点，他们在与笔者的交流中反复提到“身份认同”，家庭语言政策更为立体和具有规划性。

随着时代发展，近代中国移民浪潮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要素”的变化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已由最早的“劳动力”出海转变为“资本”出海，更有“科技”出海的趋势。近几年中资企业大量跨国收购欧洲企业可见端倪，比如长飞光纤收购欧洲电缆制造商 Radio Frequency, 嘉里物流收购法国货运公司 BBA, 瀚翔生物收购意大利医疗设备公司 EB Neuro, 爱科科技收购德国智能切割制造商 ARISTO, 江南布衣收购英国设计品牌 Established&Sons, 腾讯收购芬兰游戏开发商 Supercell, 美的集团收购德州机器人制造商库卡, 吉利控股收购瑞典汽车沃尔沃, 恒大收购德州足球俱乐部多特蒙德等等，资本出海的领域已经涵盖了能源、工业制造、艺术、游戏、娱乐、科技等各个领域，相应而来的是我们在教育领域深切感受到的欧洲青年人对中文及中国文化学习的迫切需求，以及“中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机遇。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笔者的研究下，发现欧洲华侨华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汉语继承语家庭语言政策仍缺少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应用指导，也缺少更为有效的社会资本投资。因此，从教育从业者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家庭语言政策理论的创新研究，抑或是家庭语言政策的实践应用指导，仍有巨大的潜力和机遇。

（四）通过有效的继承与文化学习解决身份认同的缺失和社会投资的实现

不可否认社会资本在家庭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以及更多外在的因素，比如家庭语言政策也在影响着汉语继承语的学习。家庭的支持计划可以帮助个人发展更灵活的语言意识形态，通过科学的家庭规划，有效继承家庭资本，多参与跨国文化的交流活动，让这些人可以在跨文化交际中灵活运用语言，以促进理解和文化知识共享。既能加强个

人的语言能力，同时也能一定程度解决父母辈和子女辈人身份认同的缺失。这些家庭将双语或者多语能力视为一种宝贵社会和经济资源，并将两种语言视为孩子语言库的一部分。如果在以后的生活中，加强开展更多的跨文化活动，将汉语继承语和文化转化为资源，有助于加强汉语继承语语言的发展，并促进年轻一代的多语言发展，也能够解决身份认同的缺失，优化家庭的发展，家庭社会投资更好地实现。

笔者认为具备一定条件的海外华侨华人家庭可自发地、系统地构筑家庭语言政策方案，该方案应是情感交互与社会投资并重，且家庭祖父母代/父母代/子女代不同代际交互影响的螺旋式方案。首先，不同代际应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交流，如传统媒体、新兴媒体、旅行、时事热点等分享，降低对汉语继承语学习的主观层面的抵触情绪，形成以“身份认同”为目标的情感定位共识，将汉语继承语与本土语言两种语言都视为语言库的必要组成。其次，家庭语言政策的载体应由工具导向和技能导向不断向事件导向和人文情感导向转变，比如从单纯的“听说读写”技能需求向更具有时代特点的事件或人物聚焦。最后，家庭语言政策的社会投资正随着移民潮的时代转变也发生着侧重点的变迁，随着欧洲浙籍华侨华人社会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年轻一代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有机会获得报酬更高的工作，因此他们有更多机会获得更好的资源。例如，许多家庭能够更频繁地前往中国探亲访友，或者有些人作为侨领可以回中国参政议政。这样的交流，使得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得到加强，更丰富他们的语言输入。正如受访者提到的：“提供去中国的环境，让他们的孩子自己去实践，去了解文化、历史和传统！”

参考文献

- 浙江省华侨志.(2010).浙江古籍出版社.
- 周敏康.(2020).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初探.华文教学与研究,3,1-17.
- 李英姿.(2018).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语言战略研究,3(1),58-64.
- 范明林、吴军、马丹丹.(2018).质性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 Spolsky,B.(2004).Language poli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olsky,B.(2012).Family language policy – the critical domain.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33(1),3-11.
- Coleman,J.S.(1988).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4,95-120.
- King,K.A.,&Fogle,L.(2008).Family language policy.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2(5),907-922.
- King,K.A.,&Fogle,L.(2006).Bilingual parenting as good parenting: Parents' perspectives on family language policy for additive bilingual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9(6),695-712.
- King,K.A.,&Fogle,L.(2013).Family language policy and bilingual parenting.Language Teaching,46(2),172-189.
- King,K.A.(2016).Language policy,multilingual encounters, and transnational families.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37(7),726-733.
- King,K.A.(2000).Language ideologies and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3(3),167-184.
- Hollebeke,I.,Van Oss,V.,Struys,E.,Van Avermaet,P.,&Agirdag,O.(2022).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Spolsky's framework applied to family language polic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25(9),3228-3241.
- Bassani,C.(2007).Five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as they pertain to youth studie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10(1),17-34.
- Hennink,M.,Hutter,I.,&Bailey,A.(2020).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Sage Publications.
- Hollebeke,I.,Struys,E.,&Agirdag,O.(2020).Can family language policy predict linguistic,socio-emotional and cognitive child and family outcomes?A systematic review.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1-32.
- H é bert,L.(2016).A Postbilingual Zone: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Policy in Toronto.Tusaaaji: A Translation Review,5(1).
- Portes,A.(2001).Introduction:the debates and significance of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Global networks,1(3),181-194.
- Reynolds,A.D.,&Crea,T.M.(2017).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 youth in schools and friendship networks.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36,501-529.
- Berardi-Wiltshire,A.(2017).Parental ideologies and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among Spanish-speaking migrants to New Zealand.Journal of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Research,23(3),271-285.
- Ruby,M.(2012).The role of a grandmother in maintaining Bangla with her granddaughter in East London.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33(1),67-83.
- Devine,D.(2009).Mobilising capitals: Migrant children's negotiation of their everyday lives in school.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30(5),521-535.
- Schwartz,M.(2008).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nd heritage language knowledge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Russian – Jewish immigrants in Israel.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29(5),400-418.

A Study on the Emotional Positioning and Social Investment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Taking Five Families of European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as Examples

GAO, Xiaofen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the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overseas cannot be ignored. Spolsky proposed in his theory of language policy that the family is one of the key areas of language management and also an important place for children's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refore, the maintenance of heritage language by families is of vital importance, and the research on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also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and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 explored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of five groups of overseas Chinese of Zhejiang origin in thre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Netherlands, Germany, and Belgium). This study adopted Spolsky's (2004) theory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supplemented by Coleman's (1988)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to conduct an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data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examined the phenomena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se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language ideology, language practice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heritage language learning, as the differences in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lead to different final learning effects. Meanwhile, family, as a kind of social capital, also influences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of these people. The result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are conducive to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ation of the

heritage language practices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Furthermore, the author also noticed tha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Eurasian cooperatio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proposed to solve the lack of identit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investment through effective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learning.

Keyword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Social Investment

* GAO, Xiaofen, Zheji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Trade.